

纪念，或借纪念之名？

——传记电影《幸福山歌》的反传记论

吴湊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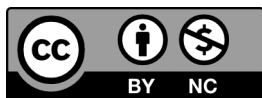
摘要 | 传记起源于对人的纪念。很多传记电影确实是来自创作者对传主的真诚致敬，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有时传记创作自身带来反传记的内核。具有传记电影典型特征的《幸福山歌》，设计了女主和方志敏会见情节，由此，将女主的出生时间较之原型人物提早了12年，产生了诸多艺术上的问题。如此设计不是完全出自艺术的考量，而是现实语境的需要。这使得该片成为一部借纪念之名进行创作从而导致内核是反传记的作品。分析该片传记性的艺术表达以及自身的反传记特点，可以映照当下文艺创作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 《幸福山歌》；方志敏；传记；纪念；反传记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诚然，每一部电影都传承它所处时代的DNA。上饶题材电影新作《幸福山歌》并非一部精品，但是，分析其传记性的艺术表达以及自身的反传记特点，可以映照当下文艺创作的一些问题。

一、传记起源于对人的纪念

现代传记学认为，传记不仅仅是一种文类，虽然“主要以文字为媒介、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但传记也可以使用其他媒介、在不同的文化形式

中出现”^[1]。也就是说，现代传记除了以文字为主要媒介外还可以使用其他媒介形式，人物传记故事电影（以下简称传记电影）即是其中新的形式之一。

电影是一种能够跨越文化、跨越时空的新媒介形式。今天，电影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在2021年3月2日的全国电影工作会上，中宣部常务副

[1]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57页。

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同志透露：2020年全国总票房达204.17亿元，年度票房前10名均为国产电影，国产影片票房170.93亿元，占比83.72%。2021年，截至2月28日，全国总票房已突破156亿元，银幕总数达到77,769块。

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完成的《光影传奇》有言：“胶片不仅仅是存储影像的介质，也承载着无数个体以及整个时代的一段段鲜活的记忆，记录着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这何尝不适用于其他一切存储形式的电影？尤其是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的传记电影，因为它是真实人物为中心，更是国家发展历史和民族精神的记忆。

从发生学考察，传记起源于对人的纪念。诚然，分析创作动机，一些传记作品的创作确实是来源于创作者对传主的真情纪念。以电影《武训传》为例，其导演孙瑜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影片的拍摄，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就是他对传主武训的强烈认可。他有感于武训“行乞办学”的可贵精神，受武训精神的感召，内心一定要通过影片呈现传主办义学的感人事迹，以及塑造其伟大的人格形象。电影的创作实为孙瑜对武训真诚致敬的一次艺术式表达。

不可否认，现在很多传记影片在片头或片尾打上“纪念×××”等字样，纪念传主、为传主作传的意味非常明显。如1997年浙江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周恩来——伟大的朋友》的片头献词是“谨以此片献给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2013年潇湘电影集团、华夏电影发行公司等出品的《毛泽东与齐白石》在序幕中打出的字幕是“谨以此片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齐白石先生诞辰150周年”。诸如此类，传记的纪念味非常浓厚，体现了传记纪念这一基本功能。

但是，传记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创作上受制于很多外在因素，导致纪念这一功能

变味。它一方面要体现纪念这一功能，另一方面又指向其他目的，自我消解了传记的纪念功能甚至其传记性，由此，传记的制作成了只是借纪念之名而已。对一部普通的电影《幸福山歌》（2019）的分析就可说明这一现象。

二、作为传记的《幸福山歌》

由江西省上饶市政协、中共信州区委、信州区人民政府、江西南国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江西越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联合摄制的故事电影《幸福山歌》于2019年9月9日在央视CCTV-6首播。该片导演武圣基，编剧程建平、史俊，男女主角姚冬妹、饶哥分别由刘思莹、邢城饰演，老表演艺术家陶玉玲饰演老年女主角姚冬妹。

这是一部无明星、无话题、观赏性不足、在电影市场上悄然无声的作品，同时，它在评论界也没有什么反响——显然，这也是必然的。但是，如美国电影评论员曼尼·法伯（Manny Farber）所说，每一部电影都在传承那个时代的DNA，因此，在电影文化批评上该片和其他热门话题电影一样具有研究价值，也是值得重视并认真分析的。

和许多传记电影一样，《幸福山歌》的纪念味也很浓。该作以片头字幕“部分故事情节取材于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民歌妈妈’姚金娜生前事迹”和片尾字幕“谨以此片献给已故江西信州‘民歌妈妈’姚金娜老师，以及千千万万用歌声记录新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华儿女”强化了影片的纪念氛围。但是，我们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是一部借纪念之名的、自我消解传记性的伪传记作品。

影片一开头就以字幕标注了故事的来源：“部分故事情节取材于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民歌妈妈’姚金娜生前事迹。”开宗明义，声明女主的故事来自原型人物。故事在结束后打出的字

幕是：“谨以此片献给已故江西信州‘民歌妈妈’姚金娜老师，以及千千万万用歌声记录新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华儿女。”这里再次强调了女主角与原型人物的内在对应关系。显然，该片带有鲜明的传记性。

诚然，女主姚冬妹与真实人物姚金娜存在诸多一一对应关系，如均姓姚，都有童养媳身份、都是江西上饶信州区人氏等。不仅如此，《幸福山歌》在叙事上还以编年体的方式展开，犹如一个标准的传记体文本，由此，整部影片宛如女主角的人生传记故事。这显见的所在是，该片的叙事有一个清晰的时间线索，依次是：1933年、1935年8月6日后不久、1941年1月18日、1949年10月1日、2019年。影片标注的时间、对应的情节与标注策略分别是：

时间1：1933年。情节是，女主参加“1933季闽浙赣（皖）苏区联欢会”，于此演唱《开口就唱共产党》并见到了方志敏。影片的标注方法是以女主演唱时背后横挂的条幅“1933季闽浙赣（皖）苏区联欢会”字样予以说明。

时间2：1935年8月6日后不久。情节是，女主阅读登载方志敏遇害消息的报纸。标注方法是女主看报知晓方志敏被害的消息，而方志敏遇害的时间是1935年8月6日。因此，影片于此标示了时间。

时间3：1941年1月18日。情节是，“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登载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诗“江南一叶，千古奇冤，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标注方法是展现当日《新华日报》的特写镜头。“皖南事变”爆发后，周恩来题词与诗均载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

时间4：1949年10月1日。情节是，新中国成立的庆典。标注方法是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游行的镜头。

时间5：2019年。情节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信州的成就。标注方法是以字幕形式告知“新中国成立70年来……”，展现信州区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外，影片还有一个非常具有传记特征的处理是故事中出现了方志敏。方志敏这一人物形象史有其人。据作为“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之一的《方志敏全集》介绍：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是江西弋阳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于1934年10月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队北上抗日，1935年1月被国民党逮捕，同年8月6日遇害。1999年8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方志敏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东北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1]

影片中，方志敏会见了前来参加“1933季闽浙赣（皖）苏区联欢会”的女主，并发表了一番讲话。1935年8月6日牺牲的方志敏出场的情节发生在1933年，作为一部具有虚构特征的故事电影来说，这在时间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何况艺术真实允许适当的虚构加工。显然，方志敏的出场符合文艺创作的一般规律，也使得整个故事更显真实，加强了影片的传记性。

就这样，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影片都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传记作品。它虽然采用首尾呼应的叙事模式，但是主体情节则是常规的线性叙事，以时间顺序逐一讲述女主角的人生故事。由此，影片成了姚冬妹（对应的原型人物是姚金娜）的人生传记故事叙事：

年轻时家庭遭受地主剥削而被迫做人家的童养媳；母亲受凌辱自杀死亡；在党组织的领导

[1] 方志敏：《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第1页。

下投身农民革命运动；以上发生在1933年或略前一点时间。参加“1933季闽浙赣（皖）苏区联欢会”，时在1933年；阅看报纸知道方志敏遇害的消息，时在1935年8月之后不久；参加抗议国民党当局分裂抗日活动的游行，时在“皖南事变”后的1942年；在饶哥牺牲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时在1949年10月；见证了新中国70年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目睹了信州区的新面貌，时在2019年……

三、《幸福山歌》内核的反传记

《幸福山歌》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体现了传记电影的基本特征，但是，在一些细节设计上又是失真的，在内核上却又是反传记的。

影片没有直接告诉观众女主的出生时间。但是，根据故事中人物对话可推知，女主的出生时间最晚在1917年。这是因为，在女主参加“1933季闽浙赣（皖）苏区联欢会”之前的一个晚上，她和父亲有一个“拒婚”对话。当时，父亲劝说作为童养媳的女儿早点圆房，女儿却以自己年龄还小拒绝，说：“我才16岁”。因此，根据女主此后不久参加“1933季闽浙赣（皖）苏区联欢会”这一情节，可以推断：女主的出生时间不能晚于1917年。影片故事结束的时间是2019年，最后一个镜头是呈现老年女主在孙子的搀扶下渐渐远离的背影。也就是说，该作以一部常规故事电影的时长，至少讲述了女主从1917年到2019年间102年的人生故事，而其中重点是讲述了女主自16岁起的长达86年之久（1933年至2019年）的人生故事——虽然1949年以后的70年故事是以跳跃、一笔带过式讲述的。

根据前文分析，女主的出生时间不能晚于1917年，故事讲述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2019年时，陶玉玲饰演的老年女主竟然还举行了个人专场音乐会。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此时女

主的年龄至少在102岁了。

据官方资料介绍，原型人物姚金娜（1929年10月6日—2017年4月16日）生于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郭门村。她幼年丧母，12岁便成了童养媳，“读书”对于那个时候的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新中国成立后，姚金娜开始接触知识，她上夜校、学文化，参加了工作。天性乐观的她，酷爱唱歌，目睹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又亲身感受到党的关爱，姚金娜就把自己身边的人和事，自己的感受编成歌谣唱出来。她提笔写的第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开口就唱共产党》。主要代表作有：《开口就唱共产党》《呼牛调》《摘菜》《上饶龙船调》《上饶渔鼓》《好粮好棉卖给国家》等。^[1]

两相对照，女主姚冬妹的故事确实是以原型人物姚金娜的生平为依据，彼此确实存在诸多对应关系。但是，原型人物姚冬妹在1933年只有4岁，在1935年方志敏牺牲时也只有6岁，是不可能与方志敏有任何交集的。而影片中姚冬妹却在1933年参加“1933季闽浙赣（皖）苏区联欢会”并会见了方志敏，这显然是将女主的出生时间较原型人物至少提前了12年。这是对原型人物故事的严重篡改。

当然，传记电影也是故事电影的一种，允许艺术加工，可以进行适度虚构。或曰，传记电影虽然有其类型的独特性，但也是故事片中的一个类型，具有一般故事片的共同特征。具有权威性的《中国电影大辞典》对“传记片”条目的界定是：“以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生平业绩为题材的影片。主要情节受历史人物本身事迹的制约，不能凭空虚构，但允许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作合情合

[1] 商建榕：《上饶民歌演唱家——姚金娜》，载政协上饶市信州区委员会编《信州文史（第一辑，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第213-218页。

理的添加和润色。优秀的传记片具有史学和文学价值，如中国影片《林则徐》《聂耳》《董存瑞》和《孙中山》等。”^[1]

这一定义除了对传主的身份界定有争议外，有关传记电影的特征还是大体成立的，即“主要情节受历史人物本身事迹的制约，不能凭空虚构，但允许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作合情合理的添加和润色”。

以此作为参照，《幸福山歌》还是大体符合传记电影的一般特征的。“允许在真实材料的基础上作合情合理的添加和润色”，可以作为设计女主会见方志敏的理由，但是，将这个传记性很强的作品的女主的出生时间提前12年，则是违背了传记电影创作原则的，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情节点，事关主人公的生卒年限，而“主要情节受历史人物本身事迹的制约，不能凭空虚构”。

需要强调的是，影片没有明确说明女主的出生时间最晚在1917年。我们无法探究这是因为创作者没有注意这个细节，还是有意隐而不说。女主的出生时间最晚在1917年，是我们根据影片的前后情节严格地推断出来的。

那么，影片为什么将女主的出生时间做这么大的改动呢？答案在方志敏这一人物身上。女主与方志敏会见的1933年是影片第一次标注的时间。如果没有“会见”这一情节，那么，女主的出生时间将会被模糊处理，不会带来以上问题。

也就是说，“会见”这一情节本来是可以删除的，方志敏可以不出场，并不影响人物主要故事叙述。那么，故事中为什么会出现方志敏，这个与原型人物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历史人物呢？似乎是以求得影片的传记真实性，因为，方志敏同原型人物一样都是赣东北名人，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且是现代革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从艺术创作上看，方志敏出场与否似乎都行，但是从叙事逻辑上看，他的出场使却得女主的出生

时间较比原型人物提前了12年从而违背了传记电影创作的重大原则，更使得老年女主在102岁还能举办个人专场音乐会这一极不真实情节的出现。显然，方志敏的出场不完全是出自艺术考量，因为，这在艺术上并没有强化真实性，反而使得整个故事严重失真。

那么，我们只能从现实语境看，将会发现方志敏需要且必须出场，与传记艺术本身关联不大。这可以从下面消息中得到解释：“该片部分故事情节取材于信州区‘民歌奶奶’姚金娜生前事迹，讲述了赣东北山歌大王姚冬妹与红军战士饶歌因山歌结缘并肩作战，带领大家创作红歌、推翻地主，建设和发展赣东北苏区，后来饶歌不幸牺牲，冬妹带着他‘气不断，歌不停’的嘱托，坚持传唱山歌直到当代的感人故事。该片主题积极向上，巧妙地把赣东北山歌融入革命斗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红色爱情故事当中，展现和赞美了老区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跟随方志敏保卫红色政权的光辉历史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故事充满正能量，曲折委婉，创意角度独特新颖，情节紧凑可信，催人泪下。该片中，再现了方志敏的光辉形象和体现了他对红色文艺战士的亲切关怀。”^[2]

这是官方网站对影片的介绍。原来，影片重点是“再现了方志敏的光辉形象和体现了他对红色文艺战士的亲切关怀”。如此，方志敏出场的会见情节是创作者的精心设计了。也就是说，该片创作的更内在的主旨，是要“再现方志敏的光辉形象”。诚然，该片的制作完成，成为上饶市政协年终工作的政绩之一：在2020年6月21日中

[1] 张俊祥、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第1395页。

[2] 故事片《幸福山歌》9月9日将在央视电影频道首播，https://www.sohu.com/a/339290215_684893，访问日期：2023年5月25日。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饶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幸福山歌》在央视播出”作为上饶市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被强调。^[1]

此外，上饶市政协主席在当年的工作报告中对此专列一段文字加以特别介绍：“《幸福山歌》在央视播出。这部由市政协创作的故事片歌颂了信州原生态歌手姚金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和‘开口就唱共产党’的事迹，于去年9月9日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2]

于此可见，电影《幸福山歌》表面上是传记，是一部纪念之作，如片尾字幕所言“谨以此片献给已故江西信州‘民歌妈妈’姚金娜老师”，但是，更根本的是地方政府的推动。由此可知，这是一部典型的借纪念之名进行创作从而导致内核是反传记的电影作品。

四、结语

主要讲述女主姚冬妹故事的电影《幸福山歌》，建立在原型人物姚金娜生平故事的基础上，在诸多情节设计上以后者的历史故事为依据。但是，该片安排与原型人物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方志敏与女主进行一次会见，这满足了现实语境对当地革命先驱者进行艺术塑造的诉求，但却产生了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不佳艺术效果，即影片好像主要是在讲述女主的故事，姚金娜是纪念原型人物，但内核却是要出现并歌颂方志敏这一人物形象。

学者在论及好莱坞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时，说电影的虚构世界不是由任意选来的当代社会的样品占据的，即银幕上的人物不是随意选择的。

“社会中的某些群体是以不均衡的频率出现的，而另一些群体的再现则是不充分的、甚至是完全缺席的。”^[3]如果把传记电影的银幕作为一个窗口，那么，谁能够或者说有资格走向窗口中央、多少频次地出现在窗口中央，就具有现实语境分

析的意义了。方志敏在《幸福山歌》的出场，就显现了他高频率出现的当下现实文化语境。

如何才能创作出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鲁迅在《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中有言：“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4]所言至今还极有启示意义。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当然，产生诸如此类问题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些文艺作品的创作完全服务于现实的某种功利的需要，导致文艺工作者在文艺创作中缺失发自心底的爱。而对文艺工作者来说，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因此，我们必须静下心来、精益求精地搞创作，心底更要有爱，发自内心真诚地创作，如此，才能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才能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艺的殷殷期待。分析《幸福山歌》的得失，当能警醒当下的各类文艺创作。

[吴湊春 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1] 上饶市政协四届五次会议隆重开，<https://jxsr.jxnews.com.cn/system/2020/06/22/018940401.shtml>，访问日期：2023年5月25日。

[2] 程建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饶市第四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http://www.srxz.gov.cn/alingdaojianghua/2020/0703/5768.html>，2023年5月25日。

[3] [美] 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修订版）》，李迅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第186页。

[4] 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37页。